

【荷兰】皮特·何 【美】瑞志·安德蒙 主编 李婵娟 译

嵌入式行动主义 在中国

China's
Embedded Activism-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of a Social Movement

社会运动的 机遇与约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荷兰】皮特·何 【美】瑞志·安德蒙 主编 李婍娟 译

嵌入式行动主义 在中国

China's
Embedded Activism—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of a Social Movement

——社会运动的机遇与约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嵌入式行动主义在中国：社会运动的机遇与约束 / (荷) 何，
(美) 安德蒙主编；李婵娟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097 - 3488 - 9

I. ①嵌… II. ①何… ②安… ③李… III. ①环境保护 - 研究 -
中国 IV. ①X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86393 号

嵌入式行动主义在中国 ——社会运动的机遇与约束

主 编 / [荷兰] 皮特·何 [美] 瑞志·安德蒙
译 者 / 李婵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皮书出版中心 (010) 59367127 责任编辑 / 李舒亚 郭 峰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cn 责任校对 / 刘宏桥
项目统筹 / 邓泳红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5.8
版 次 /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字 数 / 265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488 - 9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Edited by Peter Ho and Richard Louis Edmonds

First published 2008 by Routledge

2 Park Square,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OX14 4RN Simultaneously
published in the USA and Canada by Routledge 270 Madison Ave, New York,
NY 10016

Routledge is an imprint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an informa business

© 2008 Peter Ho and Richard Louis Edmonds

Typeset in Times by Wearset Ltd, Boldon, Tyne and Wear

Printed and bound in Great Britain by TJI Digital, Padstow, Cornwall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inted or reproduced or
utilis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mechanical, or other means, now
known or hereafter invented, including photocopying and recording, or in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s.

British Library 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 Data

A catalogue record for this book is available from the British Library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 Data

A catalogue record for this book has been requested

ISBN10: 0 - 415 - 43374 - 6 (hbk)

ISBN10: 0 - 203 - 94644 - 8 (ebk)

ISBN13: 978 - 0 - 415 - 43374 - 7 (hbk)

ISBN13: 978 - 0 - 203 - 94644 - 2 (ebk)

本书根据 Routledge 2012 年版译出。

献给中国的绿色环保行动者们

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韩非子（公元前 233 年）

前 言

许多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在实现经济发展和转型奇迹的同时，并没有改变其根本的政治制度，同时也预测，如果中国不尽快实施政治制度变革就会面临经济崩溃。这个预测发表于两部专题论文：《中国：虚弱大国》和《中国转型的陷阱》。^① 有关中国经济崩溃的预测已经屡见不鲜，曾经被多次提及。这些预测主要源于中国经济改革以来就一直存在着的各种社会矛盾的现实，三十多年过去了，事实证明虽然这些矛盾依然存在，但中国仍处于一个稳定的发展态势。

本书认为，有关中国经济崩溃的观点缺乏对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政治变革的本质考量：一场渐进的、逐步走向多元化的、具有制约与平衡作用的多层次政府制度正在建立过程中。如果政治变革与经济变革开始于同一时间，那么中国经济崩溃的结局是必然的，且早就已经崩溃了。但政治变革的关键因素是公民社会，更具体地说，就是公民行动主义以何种方式在国家与社会中间起互动和中介的作用，它一方连接政策制定者，另一方连接其他公民。在解释公民行动主义如何在中国发生的时候，本人与本书的其他作者共同提出了一个关键术语——嵌入式行动主义。

社会理论提到，公民社会与公民行动必须以国家充分自治与独

^① Susan Shirk:《中国：虚弱大国》，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Pei Minxin:《中国转型的陷阱》，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



立为前提才能发生效用。如果这些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公民社会与公民行动主义则会面临失效的危险；从而导致政治上的无效。但是，最令人困惑的案例是，中国的公民社会证明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的民间积极分子依靠国家政府，采取与政府合作的态度，并通过在国家政府部门工作的方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影响力。本书通过对兴起最早的中国民间社会和其中最活跃的领域——环境领域为重点来阐释这个机制。

社会科学家遭遇的基本难题之一就是发现理论与事实之间存在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科学家采取了“削足适履”的方法，这个典故说的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普洛克路斯忒斯将行人放在他的床上，短了就拉长，长了就用斧子砍断，以此来达到所有行人都与他的床一样长的目的。同理，有的科学家也会用事实去套理论。相反，有些科学家则可能会重新考虑，甚至否认既有理论来解释他们所观察到的现实。类似于后者，本书就是一个解释、重新思考并形成新理论与新概念的一个长期的过程。另外，在试图说服同行接受这些新观念时，我们也经历了一个同样艰苦的过程。

在第一次将本书的底稿送专家审阅之后，我们遭到了强烈的批评。“嵌入式行动主义”概念的提出被认为是放弃了“自治”，也就是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基础。批评观点认为，公民社会与国家的结合是造成公民社会在政治上无效的最直接原因。在不断与各方进行协商的过程中，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自己想法的出路。当我们发现这本书受到学术界一致好评的时候，大家感到十分欣慰。一位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评论员将“嵌入式行动主义”的概念描述为“一个十分可贵且有用的理论透镜”。本书还被提交给香港研究资助局，被认为是一种“最重要的观察”。本书还受到哈佛大学教授兼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的赞扬，这位建筑师曾经主持设计了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总部大楼，并在2008年入选《时

代》周刊全球最具有影响力的百位人物排行榜。^① 近期，出版商决定于2012年出版本书。这表明我们能够理解中国发展，并在将其概念化方面做出了贡献，尤其是提出中国公民社会与公民行动主义的一些观点。

该项目是在众多学富五车且不辞辛劳的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与合作下完成的。而本书的出版同样得益于这些人的帮助。为此，我由衷地感谢（排名不分先后）北京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的李来来、“自然之友”的梁从诫、Both Ends的Huub Scheele和Wiert Wiertsema、环境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的王灿发以及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的王名。另外，我还要对国家环保总局宣教办主任刘国正、全国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自然委员会委员姜晓柯和民政部副部长秘书邢军表示衷心感谢。

同时，还要感谢Elizabeth Economy、Takwing Ngo、Frank Pieke、Mario Rutten、Mark Selden、Julia Strauss以及另外两位匿名审稿人为本书做出的详尽且有针对性的点评。另外，还要特别感谢David Goodman，他不仅为本书的许多部分做了评述，更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与帮助。

最后，我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出版中心邓泳红主任、郭峰女士致谢，感谢她们对本书的支持与不懈努力，使本书的中文译本的出版成为现实。

皮特·何

2012年，莱顿

① 参见《中国季刊》2008年第196期，第934~935页；香港研究资助局，参考编号553111，2011年4月，第3页；还有荷兰的2008年6月6日《新鹿特丹公报商报》（NRC Handelsblad），第12~13页。



目录

CONTENTS

- 1 引言：嵌入式行动主义与政治变迁 皮特·何 / 1
- 2 组织自律与“去政治化”的政治立场 皮特·何 / 27
- 3 国家视角：社团主义控制下的环境类非政府组织
..... 姜 如 莱昂纳多·奥托拉诺 / 60
- 4 媒体、公民社会与绿色公共领域的兴起
..... 杨国斌 克雷格·卡尔霍恩 / 90
- 5 集体时代的草原活动：乌审召的社会主义
政治与地方策略 姜 鸿 / 119
- 6 表达异议的渠道：解决环境抗议方法的制度化过程
..... 安娜·布雷特尔特 / 151
- 7 “保护居民利益”而非“反抗国家”：来自上海社区
城市行动的启示 朱建刚 皮特·何 / 201
- 8 划疆而治？——中俄边境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 孙燕菲 玛丽亚·西亚克尼欧克 / 230



9 中国基层的跨国倡议：国际合作的收益与风险

..... 凯瑟琳·默顿 / 261

10 时间与变迁对中国绿色行动主义的反思

..... 皮特·何 瑞志·安德蒙 / 287

缩略语表 / 301

1

引言：嵌入式行动主义与政治变迁

皮特·何*

如果一个非政府组织想要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首先必须知道政府在做什么。当前，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只能对政策制定的结果，即政策条文有所了解，但是却对政策的制定过程不得而知。在这种情况下，非政府组织并不比老百姓知道得更多。我们要问，非政府组织真的知道自身应当如何去影响政策吗？对于那些知道该如何去做的组织而言，还需要考虑很多实际条件。如果因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发生冲突而影响了对政府行为的监督，那非政府组织的存在还有什么用呢？中国的政治体制与西方相比存在较大差异，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社会的发展与这种政治体制之间

* 皮特·何，首席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和发展研究，荷兰莱顿大学当代东亚研究中心（MEARC, www.mearc.eu）主任，发表过许多 ISI - 索引文章，包括影响因子为 3.0 - 8.25 的科学期刊。研究涉及中国和亚洲的环境主义与非政府组织、风险与生物技术、产权与制度变迁以及自然资源管理等领域。作为顾问，皮特·何为荷兰首相与中国政府、OECD、欧盟以及包括 PBS、BBC 在内的多家媒体等提供长期咨询，著作由牛津大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outledge 和 Blackwell Publishers 出版。



存在紧密的联系。

——张天柱^①

“缺少基本政治变革的经济转型”是中国改革经验中的一个巨大谜团。首先，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经济改革以来，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社会领域，中国都在经历着重大的变化。许多学者在相关文献中也提到了诸多表现，比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重要性的提高、^②乡村民主的发展、^③公民意识的觉醒与发展^④以及公民社会初显端倪^⑤等等。由此看来，虽然将“民主”视为“群众涌上街头”是极具吸引力的，但是同时，这种期望也会导致我们对“民主”的误解，这种误解正是因为缺乏对中国正

① 张天柱，我国早期投入清洁生产领域的科学家之一，重点进行清洁生产、环境系统规划管理的教学与科研。

② 例如，Melanie Manion指出，虽然选民在选举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候选人时会受到党组织的约束，但他们的作用并没有被轻视。她指出：“这些选举中呈现出了一种选民与党委的结盟偏好，这种偏好反映出与正统列宁主义对党与社会之间关系完全不同的观点，而且也与多元论者把选举视为民主工具的观点有着根本的不同”；Melanie Manion《透视中国民主化：乡镇一级的选民与选举》（Chinese Democratization in Perspective: Electorates and Selectorates at the Township Level），《中国季刊》2000年第163期，第765页。

③ 参见王振耀《村委会：中国民主化基础》（Zhenyao Wang: Village Committees: The Basis for China's Democratization），载于Eduard B. Vermeer, Frank N. Pieke与Woei Lien Chong编《中国农村发展中的合作与发展：在国家与私人的利益之间》（Cooperative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Between State and Private Interests），Armonk: M. E. Sharpe出版社，1998，第239~255页。

④ 有关公民与公民社会信息请参见Merle Goldman与Elizabeth J. Perry《现代中国公民含义的转变》（Changing Meanings of Citizenship in Modern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2002。

⑤ 参见Robert P. Weller《替代的公民性：中国与“台湾”的民主与文化》（Alternate Civilities: Democracy and Culture in China and “Taiwan”），博尔德：Westview出版社，2001。另参见皮特·何《无冲突的绿化？中国环境保护主义，绿色非政府组织与公民社会》（Greening Without Conflict? Environmentalism, Green NGOs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发展与变革》第32卷，2001年12月刊，第893~921页。

在发生的政治变革及其实质和过程的正确理解。概括地说，中国正在经历的政治变革的实质是：国家政治体制逐渐适应日趋复杂的多元社会的渐进式过程。提到这一点，我们会问，有限的政治空间对于中国社会运动的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可能或者正在发生的社会运动是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与公民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另外，中国目前出现的社会运动会走向何方，而其又是如何与来自国际范围内的压力进行互动的？

上述这些问题正是本书探求的方向，而我们将重点通过对现代中国公民社会最早兴起也最为活跃的领域，即环境保护领域的关注与考察来解答这些问题。在运用中国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本书将主要运用学科领域研究的方法来构建理论体系，我们所探讨及使用的概念也绝不仅限于中国范围内。伴随着剧烈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转型，中国的现实将为有关社会运动的研究提供丰富的背景资料。因此，来自中国的实例将是任何进行社会运动比较研究的学者所必须关注的。在本书中，我们要指出的是，中国目前的体制和日趋扩大的公民与志愿者的社会行动空间，两者相互作用正在中国衍生出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而社会运动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表现出“嵌入性”的特征。^① 中国社会与以“对社会施以极权统治 (Totalitarian Control)”为特征的完全专制 (Fully Authoritarian) 政治环境^②不同，其政治环境为国家范围内的集体行动减少了社会不

① 通过它我们追溯到 Polanyi 对社会行动被嵌入到情境化之下的想法。参见 Karl Polanyi 《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纽约：霍尔特，莱因哈特，1944。

② 完全专制国家其实是一个抽象概念，因为没有任何国家具有能够实行完全极权控制的能力。例如参见 David Crook 与 Isabel Crook 《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Ten Mile Inn)，伦敦：Routledge Kegan Paul 出版社，1959 年。另参见 Anita Chan, Richard Madsen 与 Jonathan Unger 《毛邓体制下的陈村》(Chen Village under Mao and Deng) (修订版)，加州大学出版社，1992，第 32 ~ 33 页。



稳定的风险。

在限制性政治环境中发生的社会运动基本上是不可见的，这种不可见的社会运动是通过自律以及自觉保持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去政治化”理念实现的。一方面，为了保持自身的生存，社会运动^①必须服从“党”和“国家”的领导以获得合法性，同时保持着不引人注意且半神秘化的存在方式。^② 在获得合法性的同时，社会组织对党和政府的依赖也同时带来了组织自身的约束，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社会组织难以与市民以及国际资助者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社会运动的行动者们必须采取“非面对面”的策略以避免显示出任何与政策失洽的暗示，即使是最轻微的暗示也要避免。在环境保护领域，中央政府与环保主义者是以合作者的姿态出现在地方政府面前并与之博弈的。^③ 另一方面，这种环境使得党、国家以及市民组织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不清，但是同时，这种社会运动存在的背景对于绿色行动主义却是有利的，这

① 关于社会运动概念的讨论，参见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与 Mayer N. Zald 编《社会运动的比较视角：政治机会，动员结构与文化架构》（*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第 13 ~ 17 页。

② 关于中国社会运动的一些最新研究，参见 Dongning Yang 《中国的环保运动正在兴起？》（*An Emerging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China?*），《中国季刊》2006 年第 186 期，第 333 ~ 356 页；Feng Chen 《中国工厂的私有化及其不满》（*Privat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in Chinese Factories*），《中国季刊》2006 年第 185 期，第 42 ~ 60 页。这篇文章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运动出现的可能性很小，无论是在环境领域中（Stalley 与 Yang），还是在劳工运动领域（Chen）。但是这两篇文章均没有关注中国行动主义的嵌入性。

③ 例如，基于财政收入与工人就业的必要性，当地政府通常倾向于保护污染行业，而政府与环保分子在环保方面更有可能穿连裆裤。因此，污染工厂常常难以关闭。另参见 Benjamin van Rooij 《中国环境法的执行：定期执法与政治运动》（*Implementation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Law: Regular Enforcement and Political Campaigns*），载于皮特·何与 Eduard B. Vermeer 编《中国增长的极限：国家与社会的绿色前景》（*China's Limits to Growth: Prospects for Greening State and Society*），《发展与变革》（特刊）第 37 卷，2006 年第 1 号，第 1 ~ 271 页。

一点可以通过过去几年迅速增加的环保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得到反映。大量社会组织是以非正式组织、虚拟组织以及公司的形式存在的，这样就可以绕过社会团体注册登记条例的约束。此外，绿色行动主义者通过非正式网络和渠道与官方机构建立联系。通过非正式纽带关系，这些组织能够发展出更有效调动资源的组织结构，对市民察觉到的或者渴望获得的权利加以呼吁，并且可以采取适当的方式与国家主导的信息发布体系相对抗，此类信息大多是社会热点问题，比如劳工权利、性别问题、大坝建设以及核能源等。

中国政治体系的二重性，即集限制性与有益性于一身的特征是中国社会行动主义嵌入性本质的基础。进一步而言，这种嵌入性或许会对中国的政治变迁起到基础性作用，而使其不会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发生瞬间的政治变革。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有关社会运动与政治变迁之间关系的文献进行综述，其中主要是关于绿色行动主义的。第二部分对社会和绿色行动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行讨论。最后一部分对社会与绿色运动中的重要概念，也是本书的核心概念——中国环境保护主义的嵌入性（Embeddedness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ism）进行阐释。

通过运动实现变化

本书对中国绿色行动主义（Green Activism）的阐述，向我们揭示了其独有的动态过程以及集体行动的含义，其特殊含义与以往理论描述及假设之间存在的分歧促使研究者不得不对相关概念以及研究思路重新加以审视。这种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实存在的，就如同在社会与绿色运动的形式方面既存在嵌入式的、不引人注意的行动方式，也存在广泛参与的群众运动；而在政治变革领域，既有剧烈



的政治体系的突变，也有由基础而发的、循序渐进的政治变革。^① 虽然有时并没有明确指出，但是在关于社会运动与环保主义的国际上的文献中普遍存在一个前提假设，即来自社会与绿色运动的普遍压力会迫使政治家调整治理方式以顺应民众的要求。

社会运动 (Social Movement) 与官僚政治行为 (Bureaucratic Politics) 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是缓慢的、“应付”性的，而授权性的社会运动则因为非制度化特征及其与草根民众的密切关系，而被认为会对政治变革产生显见的、基础的作用和影响。^② 社会运动的最终结果当然是实现政体的变革，即从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转变为多元、自由和民主的政治体制。^③ 自 1989 年柏林墙倒塌之后，大量文献开始探讨在国家转型时期，环境运动在民主进程中所扮演

① 一般的社会运动与嵌入性运动的区别，类似于剧烈变化与逐步变化的区别，当然这是理想意义上的类比，更确切地说，嵌入性政治变革的形式与类型都应当看做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变化。

② 参见 Charles Lindblom《仍在试错，尚未终结》(Still Muddling, Not Yet Through)，《公共管理评论》1979 年第 39 期，第 517 ~ 37 页；Charles Lindblom：《渐进决策科学》(The Science of 'Muddling Through')，载于 Jay M. Shafritz 与 Albert C. Hyde 编《公共行政学经典》(Classic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第三版，贝尔蒙特：Wadsworth 出版社，1992。社会运动作为新治理和新政治的工具，Jameson 等人写道：“20 世纪 70 年代初，在所有西欧与北美的国家出现的社会运动均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通过创造‘新政治’的方式拓宽既有的国家政治文化的限制。这意味着，这些社会运动并不是主要由那些新利益群体不断地与暨有政治话语寻求合作的实践所组成。相反，这些新的社会运动致力于社会剧烈变革：揭露暨有政治的缺点与局限性，并试图开辟新的政治活动空间”。参见 Andrew Jamison、Ron Eyerman、Jacqueline Cramer 与 Jeppe Laessle《新环境意识的缔造：瑞典、丹麦与荷兰环境运动的比较研究》(The Making of the New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in Sweden, Denmark and The Netherlands)，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0，第 192 页。

③ 关于全球层面社会政治变化的论述，参见 McAdam、McCarthy 与 Zald (1996) 的第 4 章与第 5 章，引自 Margaret E. Keck 与 Kathryn Sikkink《跨越国界的活动家》(Activists beyond Borders)，伊萨卡：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98；John A. Guidry、Michael D. Kennedy 与 Mayer N. Zald 编《全球化与社会运动：文化，权力与跨国公共领域》(Globaliza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Culture, Power and the Transnational Public Sphere)，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0。